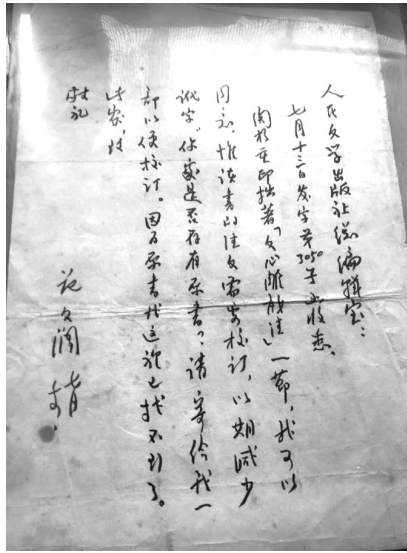




□ 李秀潭

近日翻捡旧藏名人信札，看到一通范文澜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函。

此函主要谈及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重印事。《文心雕龙》系南朝梁刘勰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范文澜任南开大学教授时，编著《文心雕龙讲疏》，梁启超阅后大加赞赏，认为该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有所发明。并为之作序。范以此蜚声士林，并获得“范雕龙”之美誉。他也从此开始自己的著述生涯，在文史界崭露头角。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完成《文心雕龙注》，成为其早期代表性的著作。

范文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最早撰写中国通史的开拓者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者。毛泽东对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范文澜的著作长期而深远地影响中国历史学界，也教育影响了几代革命者和学人。

治 学

范文澜出身于书香门第，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后裔。他生长于浙江绍兴，从小深受明清史学浙东学派熏陶和影响。早年向往章炳麟等人的学问，想走清代朴学家的治学道路。后考取北京大学，师从古文经学的传人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朝夕诵习周秦诸子经典，将“追踪乾嘉老辈”作为人生目标。经过古文经学的熏陶和训诂考据学的严格训练，为毕生从事文史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范文澜在北大追踪的“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主要思潮。其治学，以严谨求实、不尚空谈著称于世。范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范文澜先生的治学为人

文澜北大毕业后，曾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后辞职专门从事国学研究。1922年，他应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邀，任南开大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中期，京津一带是中国学术中心。南开大学位于天津，躲开了北京纷乱的政治环境，较少受时政干扰，范文澜特别看重南开的学术环境。在此期间，他在讲授《文心雕龙》《国学要略》讲义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等著作。同时接受五卅运动洗礼，毅然走出书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其一生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范文澜受到天津当局追捕，出逃北京，在北京各大学任教，并潜心著述，成为北大国学集大成的继承人。后因“共产党嫌疑”罪名被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出狱后，无法在北平活动，遂到河南大学任教，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原抗战环境日趋恶化。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找范文澜谈话，让他转移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1940年1月，范文澜辗转来到延安，出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在马列学院，他利用当时充分的时间和条件，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用于指导历史研究。他还应邀在中央党校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报告，毛泽东听后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人。

后来，毛泽东又要求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通史。因为当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而中国历史是一切中国问题的源头。范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投入材料和理论准备工作。为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他对旧史书中枯燥乏味的《食货志》《平准书》及《通典》中大量散碎资料做全面研究，呕心沥血地从中国几千年来 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汇集资料。在当年延安那种艰苦环境中，在窑洞油灯下，经过一年半的辛苦耕耘，一个眼睛近乎失明的人，最终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此书

育 才

不有先驱，无以创始；不有后学，无以昌流。范文澜作为一代史学大师，不仅自身治学刻苦勤勉，团结罗致一批学养高深、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言传身教，大力扶植后学，倾注心血培养和壮大学术后备力量，组建近代史研究团队，形成比较稳定的科研队伍。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几代学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

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出任北方大学校长和华北大学副校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选拔优秀学员作为研究生，培养历史研究人才。范文澜以其自身的学术生涯和治学之道，寄望青年茁壮成长。他教诲大家，做学问一定要坐得下来，要懂得“十年寒窗苦”的道理。灌输“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潜心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坐冷板凳、吃冷猪肉”，是一种借喻。古时庙堂上正中供奉孔子，两边是孔子的弟子和孟子等，再下边是两庑，历代儒家名人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朱熹等人在这里配享。过去只有大学问家才有资格在文庙的廊庑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享祭孔的冷猪肉。范以此勉励后学，唯有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专心致志，不慕虚名，才能成为大学问家。因为史学浩瀚无际，吾生有涯智无涯。在 人的一生中，具有研究条件又有充沛精力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促。如果将时间精力，用于追逐浮名虚誉，难免光阴流逝，白发无成。

范文澜坚持发扬中国经学家、史学家言必有据的严谨治学态度，反对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他指导研究生进行历史研究，从整理档案原始资料入手。他告诫：从档案中搜罗资料如披沙拣金，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历史学与哲学不同，是一门实学。历史研究要“务实”。

他为了写通史简编中唐代文化一节，把《全唐诗》通读一遍。他对佛教不熟悉，就让助手从全部佛经中摘录百余万字的史料长编，经过反复研读，才写出隋唐佛教部分的几万字。毛泽东评价范的著作，“一是资料多，二是好看，让人愿意看下去”。

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疏于务实而喜发高论的虚浮之风，他在中国史学会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以《反对放空炮》为题发言，明确提出反对“说大而无当的空话”，要老老实实地调查研究，语出有据，切忌言之无物，无根据地胡编乱写。

此后不久，范文澜同南京大学蒙

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等史学界学者组成民族历史研究代表团，到内蒙考察。在此期间两人一起交流切磋治学体会。考察结束后，韩儒林送范文澜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文澜生前一直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里作为座右铭。这副格言对联鲜明独到，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范文澜毕生的治学风格，以及对青年后学的殷殷期盼。在他这种严谨学风熏陶下的中国近代史所，成绩卓著，影响斐然，与大西洋彼岸汉学家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大学学派遥遥相对，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基地。

行 世

范文澜一生虽然曾经沧海，迭经风波，但他为人处世正直清廉，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是一位深沉儒雅，非常可敬又略带书生气的纯正学者。

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范文澜在学术研究领域坚持独立思考，用自己谙熟经史之长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他坚持写真实史史，反对见风使舵，随波逐流，曲学阿世。提倡做开风气或集大成的学问。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范文澜认为秦汉时期汉族已形成民族，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他提出并坚持这个观点，不惧压力和风险，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当时中央高级党校聘请的苏联教授尼基菲罗夫欲翻译他的《中国近代史》，要求删除沙俄侵占中国领土部分，范文澜断然拒绝。此举体现了中国历史上优秀史家抵制曲笔、直书历史的优良传统。

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境界。范文澜不仅有很高的学术威望，而且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入住王府井东厂胡同胡适的宅院。但他对这一切看得很淡。近代史所的同事

对他从未称过职务，均称“范老”。被誉为有“长者之风”，而没有“长官之气”。他平日生活极为俭朴。著作稿酬放在出版社，到年底作为党费全部上交。有时走亲访友，都是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他生活的乐趣全部在写作之中。为了专心致志地写书，他辞去了研究所的行政领导职务。他对儿子范元绫说：“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对新来的研究人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既然选择做学问，就不要想做官。在所里做官也做不大，最多就是加强连的连长（当时近代史所将近160人，正好是一个加强连的人数）。范文澜晚年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写作上。他在去世前因脑血栓症再次住院时，还对助手说：“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

诚然，我们也要看到，范文澜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人。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定烙印和局限性。尤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近代史所渊源于延安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之中国儒家所谓“道义”传统影响，所以在当年历次政治风波中，他作为近代史所的“掌舵人”，虽然还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尽个人所能，力求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仍然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这是那个荒诞年代老一辈人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意志无法抗拒的时代使然。

清初国学大师顾炎武曾提出理想学者的标准：“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回顾范文澜一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立身行世精神，足以成为当代学人的楷模。更重要的是，可以匡正当今学界之虚妄浮躁躁漓之风。

未已斋札记

周顒如何招待王羲之

□ 丛众华

王羲之13岁那年，有一天到当时的名流周顒家里做客。周顒曾任荊州刺史。荊州位居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上游，战略位置重要，且有着以“两湖游、天下足”著称的大片沃土。周顒守土有责，治理有方，为人称道。周顒的祖父，于汉末担任少府卿，父亲为西晋安东将军。在那样一个讲门第的时代，周顒家族无疑为一处金光熠熠的文化坐标。

当时，不少人羡慕周顒的门楣光华，想一睹庐山真面目。名士戴若思，亲自到周家走了一趟，兴冲冲而来，不多时即离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不同周顒深入交流，戴着思答：“自己那点水平，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还是早点退回来好。”驰骋疆场的武士王敦，从小与周顒相识，可谓知根知底。不知何故，王敦对周顒心生敬慕，每次见周顒，王敦都面红耳赤。即使是在天寒地冻的大雪天，王敦也扇风不止。

王羲之到周顒家做客，大概有拜会前辈的意思。王羲之亦为名门之后，他的父亲曾任淮南太守。只是，此时的王羲之，年纪尚幼，言辞羞涩，名不见经传。周顒慧眼如炬，见这孩子气宇不凡，不由暗暗叫好。

人无饮食不欢。到了餐叙时间，周家的所有访客，汇聚一堂。珍馐佳肴，鱼贯而入，应接不暇。最后，宴席的重头戏——一盘烤牛心，呈现在众人面前。这是当时大户人家宴客的最高礼仪。在水网密布、民众以稻米为主食的江南稻作耕种区，耕牛为重

要的生产工具，普通人家不可能宰牛。类似于牛肉、牛心之类的贵重食物，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财大势雄的高门大户，才能偶尔食之。职是之故，在南朝的宴席上，第一个品尝主人馈赠烤牛心的人，说明受到主人最大的青睐。

所有的访客，屏住呼吸，目不转睛，都想看看这烤牛心到底花落谁家？周顒提携后进之心殷殷，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亲自割下牛心，将它郑重地送给王羲之。

访客中，大惊失色有之，啧啧称奇有之，拍手称快有之，疑惑不解有之。年幼的王羲之，到底是何方神圣？德高望重的名士周顒为何将代表多重意义的牛心第一个赠予小毛孩王羲之？

王羲之见状则未发一语，也十分郑重地接受了周顒的馈赠。同为名士之后，他深知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下，周顒此举意味深长。这件事情在《晋书·王羲之传》中有以下记载：“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幼谔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顒，顒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顒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

“尚贤者，政之本也”。重视人才，首先要慧眼识人。“顒先割啖羲之”后，王羲之声名鹊起，名重江南。王羲之也不负周顒之厚望，感恩奋进，勤学苦练，广采众长，融冶一炉，终成一代书法大家。其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周顒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荐才的创意提携后进，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麻隧之战让泰国元气大伤，秦桓公悲愤而亡，家国重任落在了长子景公身上。独处庙堂之高，回想往昔猎猎秦风，秦景公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泰国的列祖列宗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不管多难多险，挣脱偏安一隅之缚，摆脱戎狄小邦之名，崛起之梦任重道远。秦景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家国走出麻隧之战的阴影。

秦楚再盟

在麻隧之战中，楚国袖手旁观，没有帮晋国，也没有帮秦国，保持了“中立”，晋国得以专心伐秦。晋国风头正锐，秦国独木难支，如何恢复秦楚同盟，是景公破局之要。

其实，晋楚的矛盾一点也不小于秦晋矛盾。麻隧之战三年后，晋楚又爆发郟陵之战，楚军大败，楚共王甚至目中一箭，身负重伤。至此，秦楚都清楚地认识到，两国都无法单独与强晋抗衡。于是，受伤的“小伙伴”靠拢取暖，秦楚再次频繁互动，强化同盟关系。秦景公还把自己的妹妹秦嬴嫁给了楚共王，以血亲巩固秦楚同盟。

秦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64年），秦国伐晋，向楚国求援。楚国虽然没有直接和秦军共同作战，但是派遣部队在武城（今河南南阳）集结，对晋军形成了威慑和牵制，事实上支援了秦军。晋国对于秦国试探很快作出了反击，次年晋国大将荀息伐秦。

秦楚相互呼应，秦军的主动出击也鼓舞了楚国。秦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62年），楚国向秦国发出邀请，一起进攻和晋国亲近的郑国，秦右大夫唐率军配合楚军行动。秦景公十六年，秦楚再次合兵，攻击宋国；秦景公三十年，秦楚还尝试一起讨伐吴国。郑、宋、吴，都是晋国的盟国，秦楚合兵攻之，既是演练默契，也是从外围削弱晋国，

两国在实战中增强了信心。

不败之胜

新一代秦军和新一代将领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秦国庶长鲍、庶长武、庶长无地都可以独当一面。秦景公十五年，晋军主力滞留郑国，秦景公觉得有机可乘，派遣庶长鲍、庶长武分兵两路进入晋国，在栎地合战，击败了晋军。这次胜利是对秦军极大的振奋，扫除了“恐晋症”。

当时，一代雄主晋悼公恢复了晋国的霸业，几次与诸侯会盟。晋楚争雄，秦国在背后的小动作给晋国掣肘颇多，如芒在背。秦景公十七年，楚共王去世，新的秦楚同盟有待磨合，晋悼公觉得是时候教训一下秦国了。

秦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58年）夏，晋悼公“使六卿率诸侯伐秦”，联军包括晋、鲁、齐、宋、卫、郑、曹、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三个诸侯国，声势浩大，犹如二十年前的麻隧之战，大有一举打残秦国的架势。

秦军已非二十年前的秦军，面对强敌，从容应战，毫不慌张，作战思路清晰。秦军且战且退，不紧不慢，不与联军主力纠缠，而将联军引入秦国腹地，拖长战线，疲惫敌师。联军各自心思不一，郑、宋、卫多为摇摆之国，深入秦地至泾河后，联军逡巡不前。秦军在本土作战，游刃有余，在泾河上游投毒，联军多有伤亡，但勉强渡河，继续前进，到达棫林（今陕西泾阳西南）。

联军劳师远征，但找不到秦军主力，无法对决，士气低迷，内部发生分化。主帅荀偃准备继续西进，但未能见众，晋国下军主帅栾黶甚至直接率兵回国。联军动摇之间，秦军折返掩杀，晋将栾针阵亡，士鞅被迫投秦，是为迁延之役。

对于此战，谁是获胜者，学者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联军深入秦地，占

据上风。但是，此战中秦军意志顽强，战术灵活，自身没有重大伤亡，却击杀晋国大将，联军无功而返，一扫麻隧之战的阴影，胜败已在不言中。

走一看三

迁延之役的重大意义不止于战场之上，景公还有重大收获，那就是士鞅来投。迁延之役，晋国栾氏受创，栾针死而士鞅存，栾针的哥哥栾黶对士鞅深为怨恨，士鞅无奈投秦。

士鞅是士会的曾孙，士家即范氏，是晋国望族，六卿之一。当年，秦康公得士会，大有所获，秦景公也希望在士鞅那里发现更多晋国的“秘密”。秦景公向士鞅抛出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晋国的大夫谁会先灭亡？士鞅毫不犹豫地说，是栾氏。士鞅解释，栾黶骄横跋扈，祸患估计会发生在下一代栾盂身上。士鞅的话透露出两个极为重要的信息，一是晋国虽然一时强大，但是君臣并不融洽，像栾氏这样的卿家望族尾大不掉；二是晋国国权的各大家族之间矛盾颇多，像士家和栾家就有“死疙瘩”，外人有机可乘。

秦景公政治嗅觉极其敏锐，他准确意识到士鞅的“重大价值”：士鞅回到晋国，比待在秦国更能发挥作用。于是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秦景公“大发善心”，送士鞅回国，并请求晋悼公给士鞅官复原职。秦景公的妙招可谓一举两得，一来缓和迁延之役后的秦晋关系，以示宽宏大量，占据道德和舆论的主动；二来助力晋国的“窝里反”，让晋国原本复杂的大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事实证明秦景公的远见，在接下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士家和栾家相妒相杀，公元前550年，栾氏被灭族。而在士鞅去世后不久，士家因为参与叛乱也灭亡了。

士卿大族乱晋，晋国无暇西顾。

坚忍前行

崔庆

在栾氏灭族的第二年（公元前549年），晋平公派韩起入秦，秦景公派亲弟弟公子緄入晋，达成罢兵休战的协议，秦国成了晋国内乱的最大获益者。秦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5年），宋大夫向戌举行弭兵之会，晋、楚、齐、秦四强的地位得到了诸侯各国的公认，这是对坚毅秦景公的最大肯定。

景公时代，秦国对外再次平衡了大国关系，但是对内还没有进行深度改革，国力还没有质的提升，而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都行之已久，秦国的真正崛起还有待时日。

